

第五屆世界華文傳媒與華夏文明傳播學術研討會（台北 2007）

國家利益至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報紙 的角色和雙邊課題

廖珮雯

第五屆世界華文傳媒與華夏文明傳播學術研討會
2007年7月14-16日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目錄:

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pg4
第一節 研究背景和動機	pg4
第二節 研究目的	pg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pg5
第一節 兩國報紙的角色	pg5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從反政府到親政府	pg5
新加坡《聯合早報》：從民間報紙到官方喉舌	pg6
第二節 框架理論	pg7
第三節 媒體內部與外部因素影響新聞框架	pg8
第四節 國與國的互動影響新聞框架	pg9
第五節 發展傳媒理論	pg10
第六節 國家利益的界定	pg11
第七節 研究問題	pg12
第三章 研究方法	pg13
第一節 研究架構	pg13
第二節 研究設計	pg13
第四章 研究結果	pg18
第一節 新聞則數與報導地區的分布	pg18
第二節 雙邊大橋課題的新聞主題在兩國報紙的呈現	pg20
第三節 兩國報章就新聞偏向呈現的差異性	pg25
第四節 兩國報章就新聞框架呈現的差異性	pg28
第五節 主要消息來源的分布	pg31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pg32

國家利益至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報紙的角色和雙邊課題

摘要

新加坡自獨立後，和馬來西亞一直維持唇齒相依的關係，但卻在關乎兩國國家立場和利益的雙邊課題上爭論不休，總是在同一課題談判多年卻無法達成協議，兩國都堅持自己的國家原則。本研究以興建馬新大橋事件為例，嘗試以近三年的當地中文報《星洲日報》和《聯合早報》有關此雙邊課題的新聞為樣本，用內容分析法檢視兩報如何報導及框架同一雙邊課題。研究結果發現兩份報章都扮演傳達國家政策、立場和原則的角色，達到引導民意，鞏固政府立場的目的。同時，報章也抱著和國家立場相同的價值觀，來維護國家利益。

關鍵字：國家利益、雙邊課題、框架、報紙

Research Topic: Does the benefit of the country come first? The role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s media together with the bilateral issues.

Abstract

Singapore and Malaysia's relationship appears to be as close as lips and teeth even after Singapore independent. However, the dispute regarding bilateral position and benefit between both countries was debated endlessly. The dispute has yet to be concluded after several negotiations were conducted through out these years. This is because both countries are insisting on their own principals. This research is focus into the topic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ingapore-Malaysia viaduct' and discuss by using content analyse model on how the local chinese newspaper like Sin-Chew Jit Poh, and Lian He Zhao Bao report about this bilateral topic for the past three years.

Finding from the research is that both papers' reports are based on the position and principal of their own country to let the people feel that both governments are incompetent. Meanwhile, both papers are having the same value to protect the benefit of their on country.

Keywords: national interest, bilateral issues, framing, newspapers

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第一節 研究背景和動機

自新加坡於 1963 年脫離馬來西亞而獨立之後，由於地理位置非常接近，因此和馬來西亞有著唇齒相依的關係。馬新兩地的人民頻繁往來，使聯繫兩地人民的新柔長堤，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但是，由於長堤的交通量增加，長堤經常塞車，海水污染嚴重，當時擔任馬來西亞首相的馬哈迪於 1996 年 7 月 5 日提出建造大橋取代新柔長堤的計畫（聯合早報，2006. 04. 26），但沒有獲得新加坡政府方面的即刻同意。

馬來西亞興建這座大橋主要配合南方綜合計畫，除了大橋之外，計畫還包括新關稅、移民和檢疫大廈、交通總站、陸橋、鐵道及交通樞紐公路（聯合早報，2003. 02. 15）。馬來西亞方面認為，此計畫將能協助提升腹地物流系統，活絡馬國南部的機場和港口，提升和新加坡港口業及航空業的競爭力，有了快捷的物流系統，商家會選擇更廉價的馬來西亞南部港口作為物流中心，因此興建大橋對馬來西亞南部的經濟發展，將帶來無可限量的經濟利益。

新加坡向來是世界著名的物流中心，其港口業和航空業發達，是該國的經濟支柱，高效率行政和便捷運輸設備使新加坡領先區域其他對手，但是她在貨幣匯率方面卻較馬來西亞為高，一旦馬來西亞提升其物流硬體設備，達到同樣快捷的水平，新加坡將失去競爭力。此外，新大橋建竣後將會拆除新柔長堤，而每天供應新加坡食水的輸水管是與新柔長堤連接，拆除長堤意味著輸水管面臨被拆除的危機（聯合早報，2003. 11. 22）。作為四面環海的島國，新加坡擔心食水供應可能被切斷，因此，新加坡基於大橋的興建對新加坡長期利益並沒有帶來顯著的效益為由，拒絕和馬來西亞一同興建新大橋。另一方面，新加坡也認為建橋費用龐大，人民未來可能需支付昂貴的過橋費（聯合早報，2006. 02. 18），這並不符合人民的利益。

馬來西亞於 2003 年單方面建造大橋，引起諸多爭議。新加坡較後提出，如果馬來西亞答應向新加坡供應沙，以及讓新加坡擁有馬來西亞的領空權，就同意建造大橋的協議（聯合早報，2006. 04. 26）。隨後，雙方又在供沙和領空使用權的課題上僵持不下，於是，繼任的馬來西亞首相阿都拉在今年 4 月 13 日宣布取消興建美景大橋計畫，並停止所有關於新橋的談判（聯合早報，2006. 04. 13）。他是以海沙供應和開放領空不符合人民意願為由，來解釋取消興建新橋計畫的原因。

在大橋計畫被提出後，以新加坡的立場來看，建一作新橋來取代現有運作良好的長堤，沒有甚麼好處。而馬來西亞也以國家尊嚴的立場，堅持不開放領空和供應海沙。兩國基於國家立場不同，以及維護國家利益的方向各異，造成意見分歧，而兩國的媒體在報導雙邊課題新聞時，也各站在國家立場的角度報導，使兩國媒體對於同一事件有截然不同的框架。

新橋的興建一直是兩國多年來無法達成協議的雙邊課題，而在東南亞研究中，馬新雙邊關係一直是學者們研究的題目。不過，還沒有人從傳播媒體的角度切入，研究兩國雙邊課題的新聞框架。本研究欲以此為題，選取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中文媒體於這個課題的相關報導，探討不同國家媒體的新聞框架有何不同。此外，本研究也欲了解，媒體如何基於國家立場，站在維護國家利益的角度，框架同一個雙邊課題。而媒體報導框架的不同，是否由於兩國政治型態及社會文化的不同所致？

第二節 研究目的

馬新兩國的雙邊關係可說是糾纏於許許多多的雙邊課題上，有許多是從英殖民地時期就留下來尚待解決的課題，且多為懸而未決。不過，這個大橋課題，卻是由馬哈迪提出，談判過程長達 10 年，談判方式及條件更換多次，歷經兩國領導層的更替，最後由馬哈迪的繼任者阿都拉宣布取消興建而結束。媒體在報導雙邊課題上，是呈現動態的線性過程，可說是值得以此作為分析兩國雙邊課題新聞的案例。

兩國媒體在框架同一個雙邊課題時呈現差異，主要是基於不同的國家立場和國家利益。本研究的目的是想研討國家利益觀念、政治意識形態和體制、社會文化和思維模式的不同，會否影響兩國媒體對同一課題的報導框架。

本研究主要以兩國具代表性的中文媒體為研究樣本，馬來西亞的《星洲日報》是銷售量第一的中文報，而新加坡的《聯合早報》是最接近官方立場的報章，兩份報紙皆屬於大報形式，具有可比性。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兩國報紙的角色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從反政府到親政府

《星洲日報》是胡文虎、胡文豹兄弟與鄭荔生於 1929 年 1 月 15 日在新加坡創辦，原屬胡氏族星系報業有限公司。馬來西亞《星洲日報》原為新加坡《星洲日報》的馬來西亞版，1965 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後，政府切斷馬新兩地報章間的聯合運作，《星洲日報》馬來西亞版在當地編印發行，與新加坡總社逐步分家¹。1982 年，馬來西亞政府頒布新令，不准外國人控制本地報紙，《星洲日報》的控制權遂由胡家轉到馬來西亞人拿督林慶金手中²。

《星洲日報》為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服務，歷經英國殖民地時代、抗日戰爭時期、大馬獨立運動、建國及發展。這期間，《星洲日報》曾兩度被迫停刊：第一次是在 1942 年至 1945 年，由於日軍佔領馬新兩地而中輟出報；第二次是 1987 年 10 月 27 日，因政治鎮壓行動，遭馬來西亞內政部以違反出版法與印刷法，吊銷出版

¹ 資料來源：江蘇僑網 <http://www.jsqw.com/hwqq/malaxiya.htm>

²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 馬來西亞主要新聞媒
<http://www.fmprc.gov.cn/ce/cemy/chn/malaysia/t171735.htm>

准證。1988年4月8日，在常青集團領航人張曉卿及高層人士奔走力爭下，《星洲日報》成功復刊，歸在常青集團旗下³。

復刊後的《星洲日報》如鳳凰涅槃，發行量節節上升，逐步拉開與馬來西亞其他華文報的距離，脫穎而出，成為「馬來西亞第一中文報」。目前，《星洲日報》每日銷量達33萬9139份，佔全國華文報總銷量的12.9%，華人讀者人數超過100萬，並在截至2006年9月30日的季度，取得34%的淨利增長（獨立新聞在線，2006.11.30）。

星洲報業集團和馬華公會（聯合執政黨「國陣」的其中一個政黨）及黃家定關係密切，早在2000年馬華公會黨爭時已有跡可循。張曉卿入股南洋報業控股，及黃家定出任馬華公會總會長後，雙方關係密切的程度更為顯著（莊迪澎，2005）。由於報業集團控制者張曉卿與馬華公會的關係密切，使《星洲日報》從80年代的勇於提出反對立場的反政府報紙，轉變成親政府報紙。

新加坡《聯合早報》：從民間報紙到官方喉舌

《聯合早報》是1923年陳嘉庚創辦的《南洋商報》和1929年胡文虎創辦的《星洲日報》合併的成果。當時，陳嘉庚和胡文虎辦報，有宣傳自己產品的初衷，但也一直不忘服務社會⁴。

1965年新加坡獨立後，英文成為新加坡的強勢語文，《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共同面臨著發行量和讀者人數下降的前景。為避免惡性競爭，雙方管理層在1983年達成了合併意向，開始共同出版《南洋星洲聯合早報》，簡稱《聯合早報》。因為這兩家報都是私人所有，合併根本上是一種商業行為⁵。但一些專家認為，合併背後隱藏著深刻的政治原因，即當時新加坡積極推行國家政治一體化。兩報合併以便更好地向讀者傳達與分析新加坡政府的政策與措施，把肯定國家的利益、社會整體的利益和報業本身利益結合起來，絕不為任何個人或集團利益而損及國家與社會的利益（張威、周秀芳，2001）。

新加坡政府對報業的管理是宏觀的，主要通過制定《誹謗法》等一系列法令來約束報業的行為⁶。1974年，政府修訂了《新加坡報業法令》，規定報業公司必須公開掛牌出售股份，任何個人擁有的股份不得超過3%，合併顯然是為了進一步控制報紙和輿論。新加坡在政治上對新聞界一直實行控制（張威、周秀芳，2002）。

1984年，早報和其他幾個媒體合併為新加坡報業控股有限公司，報業控股的成立也是為了集中資源，避免惡性競爭。報業控股成立後成為新加坡唯一的報業集

³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網 馬來西亞華文報刊概況

<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5/2005-08-16/26/612499.shtml>

⁴ 資料來源：早報之道——專訪新加坡《聯合早報》總編輯林任君

<http://www.cmc.pku.edu.cn/INC/Browse.aspx?ID=851>

⁵ 同上。

⁶ 同上。

團，各報雖然編輯事務獨立，但行政、經營資源共享，提高了管理效能。由此，《聯合早報》成爲新加坡政府傳達政策與措施的官方喉舌。

第二節 框架理論

1970 年代初期，Goffman 的《框架分析》一書出版後，框架理論引起廣泛的重視。Goffman 主張日常活動的「切片」依照主要架構的規則或基礎被參與者認知，此一架構可能是源於自然的產物或是社會互動後的結果，而活動認知轉換的過程有兩種模型，即過濾與重組。框架是個人對事件或資訊的設定、感知、辨識和標示的工具。他強調框架是在特定心理情境或時空中，由一群語言符號訊息所發展出來的經驗，參與者藉此建立了觀察事物的基礎架構，用以處理或分析外在世界層出不窮的社會事件（引自李人豪，2004）。

臧國仁（1999: 30-31）將 Goffman 所稱的框架與真實，歸納爲三點：

1. 社會事件轉換爲個人主觀心象時，似乎都要經歷「再現」的過程。個人藉由「框架」轉譯社會事件爲主觀認知，並透過語言成爲日常言說。這種屬於個人層次的言說，隨後在公共領域中引發更多言說，也啓動新的心象建構過程。
2. 這些心象轉換雖是真實世界的再現，但卻無法完美無缺地複製真實世界的原貌，可能只是真實「再造」的產物，兩者可能相近或互相矛盾；「再造」只是內在心智的建構。
3. 社會事件轉換成個人主觀認知的過程來看，個人似乎不斷地受到「其他社會人」的影響，使得個人框架常常也是同一社區框架的反映，個人所認定的真實，經常受到社會大眾所接受的真實影響。這種現象最常表現在語言中，並透過大眾傳播媒介的再現功能彰顯。

臧國仁（1999: 32-34）進一步指出框架的三個層次：高層次結構，指的是對某一事件主題、事件主旨的界定，代表了抽象的意旨；中層次結構，則包括主要事件、先前事件、歷史、結果、影響與評估等，爲實證面向；低層次結構，則是語言及符號的展現，包括字、詞等組合而成的修辭風格，接近言說分析或論述圍觀結構，是操作或指示面向。

Tankard, et al.（1991）指出，框架乃是「新聞內容中心思想（Central organizing idea）」，在大眾傳播的過程中，「框架」是指經新聞報導過濾，選擇呈現社會真實的本質，也就是媒介報導所框限的社會真實的範圍和性質。

框架是人們用以認知外在事物與社會真實的心理架構，並藉由語言、文字、符號、影像等訊息作爲組織事件與建構意義的工具，因此框架也反映出特定的社會文化或意識型態。此外，框架具有排他性（exclusive）和含括性（inclusive），亦即在框架的機制中會包含以及排除某些訊息與事實（Tankard, et al., 1991）。

Entman (1993) 也指出，在傳播過程中，至少有四個部分與框架相關：傳播者、文本、接受者與文化。對傳播者而言，決定傳播內容時，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框架所引導；文本方面，則是藉由突顯或規避某些關鍵字、諺語、句子、刻板印象或消息來源來呈現框架。但另一方面，接收者接觸訊息的時候，卻不一定會全盤接受傳播者和文本所給予的框架；文化則通常是框架產生的儲倉，它可被定義為經驗上顯而易見的一般框架，此框架是透過社會團體中大多數人的論述和想法而被呈現。藉由媒介框架，符號操作者能以語文或視覺符號的方式組織論域，媒介因而成為意義初級界定者，但是界定的範圍往往侷限於主流意識。框架的施行是權力關係的展現，而媒介內容中出現的框架，更是消息來源間相互競爭的結果。

框架理論主要描述媒體如何再現議題、事件。曾經有人以框架分析來建構失業新聞（吳碧娥，2004），也有人利用框架理論來分析政治人物表演行為的媒體再現（李人豪，2004）。他們通過分析失業新聞的不同面向，以及政治人物表演行為如何被電視媒體框架，來說明媒體呈現的所謂真實，已經過再造的過程。

第三節 媒體內部與外部因素影響新聞框架

框架的意義，類似心理學中的「基模」。依林靜伶（1999: 529）的定義，框架為意念的再現。意念是人們對外在世界的思考，而人們對外在世界的習慣性思考方式是有限的，而且是穩定的。就個人層次而言，框架接近認知心理學者所說的心理基模，是人們解釋外在世界的基礎，而框架形成的源頭是個人先前經驗。就新聞框架再現的意念而言，意念的來源除了事件本身外，新聞專業意理、編輯室文化、社會文化、政治意識形態等都可能是意念的來源。

從上述的觀點可推論，新聞專業意理、編輯室文化屬於影響媒體框架的內部因素；社會文化、政治意識形態則屬於影響媒體框架的外部因素。在影響媒體的內部因素上，根據框架理論，媒體會以本身的立場和對事物觀點，來重新建構事件的真實，並再現於媒介上。不同媒體具有不同的框架建構，再現的所謂真實世界，其實是由媒體框架的「再造」真實。由此，媒體在框架新橋課題時，已不是真實世界的呈現，而是根據本身的立場再造符合媒體理想的事件框架。

另外，在影響媒體的外部因素上，根據社區框架的觀點，如 Lewin (1948: 57; 引自臧國仁，1999: 31) 所稱，「個人認定的真實，經常受到社會大眾所接受的真實影響」。此種現象最常表現在語言中，並透過大眾傳播媒介的再現功能顯現。媒介內容成為公共交談的場所，使得人們藉著使用相同文字或符號而參與社會行動，成為社會公眾的一部分，進而完成社會同質性的建構。

反過來，媒體在框架新聞課題時，也會受到社區框架的影響。媒體集團內部對國家認同，會促使它們抱持與國家立場相似的觀點，所框架的事件呈現，必定與國家同行；外部的社會文化與思維模式所形成的觀點，也會使媒體受到框架的影響，以在大家所認識的框架真實里，呈現整個社群所框架的理想真實。當國民都接受社

會上的真實，這就會形成社區框架，進而影響媒體報導的框架。當人民普遍贊成國家領袖的決定，媒體就會站在人民所建構的框架立場內，再現新聞。

根據 Entman (1993) 的說法，框架主要牽涉了「選擇」(selection) 與「突顯」(highlighting) 兩個作用。框架即是指在所感知到的真實中，選擇某種觀點，使其在文本中被特別彰顯出來；此外，Entman 認為框架具有四大功能：

1. 界定問題 (define problems)：決定如何處理社會問題、所需付出的成本和獲得的利益、反映社會的文化價值觀。
2. 診斷原因 (diagnose cause)：判定辨別問題產生的原因。
3. 道德判斷 (make moral judgment)：評估社會問題的影響與結果。
4. 建議解決方案 (suggest remedies)：提供對於問題的補救方法，並預測補救方法可能的效果。

另外，Trowler (1988) 曾提出三種理論模式解釋媒體適用消息來源有所偏向的原因：

1. 操縱模式 (The Manipulative Model)

操縱模式認為媒體受社會富有及權勢階級所控制，媒介也傾向於維持現狀，在政府與資本家利益結合之下，有意識地共同操縱媒體，造成媒體內容的偏向。

2. 霸權模式 (The Hegemonic Model)

霸權模式是一種無意識的操控，認為媒體內容雖由媒體工作者控制，但媒體工作者在新聞的產製過程中，無意識地採納了宰制階級的意識型態，把新聞報導框限在宰制階級設定的理性與合理範圍內。

3. 多元模式 (The Pluralist Model)

多元模式認為媒體在選擇消息來源時，具有相當的自主性，在多元市場下，媒體為滿足不同閱聽人的需求和品味，因而產生不同的偏好，所以媒體的內容是由市場力量所決定。

另一方面，Wolfsfeld (1991) 指出，消息來源擁有的權力大小也是影響媒體框架的因素，消息來源的權力面向包括：

1. 消息來源對媒介的依賴程度。
2. 本身所擁有的政治地位及社經能力。
3. 其背後所代表的組織之規模與享有的社會資源。
4. 能否提供具新聞價值的行為。

由上可知，媒體的框架除了由記者、編輯認知、闡釋、呈現、選擇、強調以及排除外，媒介還受到外來勢力的操控，以及社會文化價值觀的影響，從而界定新聞框架，建構符合外部政治與社會的所謂真實。

第四節 國與國的互動影響新聞框架

一個事件經由「新聞典範」的闡述和詮釋，而變得有意義。雖然大多數的新聞媒體並不會自己對新聞設限，但在處理許多關係國家利益的事件和議題上，仍必須「遵照」國家的立場。尤其在國外政策上，媒體的報導更是和國家利益及經營政治

相依附的。Lee & Yang（1995）更研究了美國和日本因各自和中國有不同的政治和經濟互動，而對 1989 年中國的天安門事件有不同角度的報導。

Lee & Yang（1995）想了解不同政治立場和政治環境的國家，對於相同新聞事件的報導，是否會因為政治或經濟的因素而有所不同。美國的社會價值崇尚多元自由主義，一向反對共產思想與國家審查制度，新聞媒體更以監督國家的第四權自居。但美國媒體碰觸到國外政策時，媒體便會與國家利益和精英政治緊密連結，並且以本身的價值觀來馴化國際事件。1989 年北京鎮壓學生的暴行更喚起了美國對於自身資本主義「自由世界」的推崇，美國記者也用美國的文化及價值觀來框架天安門事件的報導。天安門事件中學生對於共產政權的抗議和訴求，也被描寫成「追求西方民主」（Lee & Yang, 1995），以符合西方主流價值觀，報導充斥西方觀點。

不同於美國崇尚自由民主的西方觀點，日本政府在外交或意識型態上的終極目標，即是將經濟利益放在第一位。經濟才是日本與國際互動的指標，而非人權，因此日本不會將西方的標準套在天安門事件的報導上。此外，日本對中國比美國對中國有更直接的安全考量。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侵略中國的角色，因此沒有足夠的道德正當性去批評中國的人權問題。

不同國家的互動會導致不同角度的新聞報導。美國將天安門事件描寫成學生為了追求西方民主價值和人權、反抗共產政權所做的奮鬥。但沒有深入研究中國學生所喊的「民主」所指為何。中國複雜的政治經濟脈絡也未見媒體剖析。日本的報導框架和美國大不相同，新聞多以描述每日最新發展為主，並沒有對天安門事件的形成背景及文化因素多加描述，也沒有任何的道德判斷（Lee & Yang, 1995）。

在馬新兩國的雙邊關係中，也象徵國與國的互動關係，兩國政治意識與社會結果的不同，會導致各國媒體以不同的角度報導新聞，而在關係兩國利益的雙邊課題上，兩國媒體更加站在國家的立場，框架同一事件。媒體報導框架的差異，則取決於兩國對外（鄰國）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這可能與各國的政治及社會的大環境有關，這些因素有形及無形地牽引著，甚至形塑媒體的報導框架。

第五節 發展傳媒理論

作為社會結構的產物，傳媒既是它們自己社會歷史產物，也是自己社會的歷史反映，並且一直起著一份作用。儘管不同社會的大眾傳媒機構有著相似之處，但就起源、實踐和慣例來說，傳媒是非常國家性的機構，它們感受到國內政治和社會的壓力，並對受眾的期望作出反應。它們反映、表達「國家利益」，有時還主動為「國家利益」服務，這是由其他更有力的行動者和機構決定的（D. McQuail, 1996）。

根據 McQuail，發展傳媒理論適合分析經歷從不發達和殖民主義向獨立和跟更好的物質條件轉變的社會。這些社會經常缺乏基礎結構、資金、傳統和專業技術，

甚至缺乏支撐傳媒機構所需的、可以與第一世界或第二世界的受眾相比的受眾（D. McQuail, 1996）。

經歷過英殖民時代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在獨立建國的過程中，媒體扮演著表達國家利益及政策的角色。政府以「亞洲價值觀」為核心，強調媒體和政府的夥伴關係（media-government partnership），媒體必須服膺於國家經濟發展的步調，作出對國家經濟有利的報導，以教育和動員大眾對國家作出貢獻。馬新兩國都認為發展傳媒理論對國家發展有利，並相信「亞洲價值觀」很好地和發展傳媒理論相結合。馬新兩國提倡的「亞洲價值觀」強調家庭在個體之上，社區在個人之上，建設性參與在反對之上，尋求集體的共識，以維護社會集體的安全和經濟繁榮。其中，馬來西亞以傳統馬來文化，作為國民團結的思想意識；新加坡則提倡儒家思想，作為國家的意識形態（Wong, 2004）。

通過檢視馬來西亞三家英文報紙在 1999 年大選期間的報導，Wong（2004）發現，媒體在報導執政黨和反對黨時，出現不同的報導方式。在指控和反駁、政治承諾、西方財政和精神支持、西方媒體和真實權威者及政治廣告方面的報導，都採取傾向於執政黨的立場，對於反對黨的報導則多為負面。Wong（2004）認為，這三家媒體較像是執政黨的喉舌，以符合社會和諧穩定，經濟成長發展的集體利益，是發展媒體理論的明顯示範。

馬新兩國曾是被殖民的國家，在建國的過程中，發展媒體理論可以很好地把政府政策傳達給人民，推動經濟發展，維護社會和諧，這樣的媒體控制一直延續到現在，而缺乏自主性的媒體也習慣這種以「亞洲價值觀」為核心的思想型態，以致在涉及雙邊關係的課題時，兩國媒體也遵循發展媒體理論的脈絡，傳達對國家利益有幫助的新聞報導，以形成人民集體的意識形態，與政府抱持相同的立場。

第六節 國家利益的界定

任何國家都會根據本國國情、綜合國力、經濟發展情況和區域及國際情勢，來衡量國家地位和國家利益。在和其他國家來往時，各國以國家利益為和他國接觸的最基本原則，如果在追求國家利益的過程中，和他國的國家利益相抵觸，則兩國間的衝突就勢所難免。綜合而言，國家不論大小，都會根據國家利益向外拓展，尋求發展機會。國家在追求利益的過程中，會遭遇挫折，而每一個國家都在保護自己的過程中，難免會和其他國家有衝突，這並不表示國際社會將永遠處於戰爭狀態，衝突時可以解決的，只要國際政治繼續運作，國家遵守共同行為規則（Morgenthau & Thomson, 1985）。

對於國家利益的界定，各學者並沒有一項統一的指標來清楚界定國家利益。在方法論中，概念的界定可分為名義界說和運作界說。名義界說又可分為字典式界說和約定性界說，前者是根據語言中使用名詞的習慣而決定其意義的方式，後者是指使用該字或名詞的人根據需要而約定其意義（楊仲軒，1994）。

各學者對國家利益的約定性界說，有不同的分類。羅賓遜將國家利益區分為六種：主要利益、次要利益、永久利益、可變利益、一般利益、特殊利益（引自楊仲軒，1994）。而紐克特蘭也提出他的分類：生存利益、重要利益、主要利益和周邊利益。另有學者為紐克特蘭的分類做了更詳細的歸納。生存利益包括：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國防、民族地位；重要利益包括：國家形象、對外貿易、工業原料和能源；主要利益包括：交換訪問計畫、經濟援助、投資、體育活動；週邊利益包括：文化活動、非官方交流（引自楊仲軒，1994）。

本研究採用紐克特蘭以美國為基礎，對國家利益的分類，並參考蔡昆宏（2003）的劃分，將國家利益界定為三大類：

1. 防禦利益：指保護美國人民、領土和機構不受潛在的外來危險之侵害。
2. 經貿利益：指推行美國之國際貿易和投資，其中包括保護在國外的美國私人公司，這也許可稱為國家經濟利益。
3. 世界秩序：指建立一個和平的國際制度，不必訴諸於戰爭即可解決爭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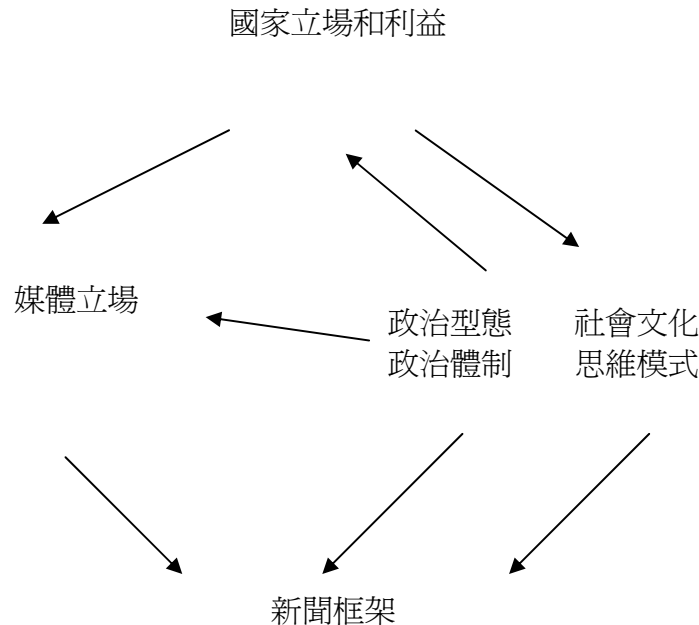
「防禦利益」涉及國家人民、安全和領土，在本研究中將之界定為「國家主權」，並包含民族尊嚴在內；而「經貿利益」和「經濟利益」相同，目標皆在提升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成長；由於「世界秩序」強調通過和平的國際制度來解決國與國之間的爭端，則講求通過外交協商的方式，與「外交」相同。因此本研究將以經濟、外交和國家主權作為界定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涉及國家利益的主要分類項目，並輔以和大橋課題相關的分類。

第七節 研究問題

1. 兩份報紙在新聞議題內容上，如何框架大橋課題的報導？
2. 兩份報紙對大橋課題的新聞數量、新聞偏向和框架有何異同？
3. 兩份報紙的新聞報導會否和各國的國家立場、國家利益一致？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欲了解：

1. 兩國的立場和國家利益，即兩國對外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如何影響各國的媒體立場、政治型態和體制、社會文化和思維模式。
2. 在媒體的內部和外部環境中，媒體立場、政治型態和體制、社會文化和思維模式，如何進一步影響新聞框架。
3. 政治型態及社會文化如何形塑國家立場和媒體立場，進而影響新聞框架。

第二節 研究設計

（一）內容分析法

研究方法以內容分析為主。Kerlinger 認為（1979）認為，內容分析是一套以系統、客觀和定量方式來測量變項或完成其他研究和分析傳播內容的方法（轉引自梁慧玲，2004）。Wimmer & Dominick（2002）認為，內容分析法有描述傳播內容、驗證有關訊息特質的假設、比較傳播內容和真實世界的差異、評鑑特定團體的形象、建立媒介效果的起點等特點（引自梁慧玲，2004）。王石番（1989）認為，內容分析法整理和估計的方式特別適用於評估媒體呈現。本研究便以內容分析法，分析兩國報紙對雙邊課題的報導，以了解兩國媒體是否受國家立場和國家利益的影響，並框架新聞報導的內容。

（二）研究時間

本研究的事件時間是以 2003 年 1 月為起點，馬來西亞不顧新加坡是否同意，將擱置了 2 年的建橋工程重新啓動，宣布堅持單方面興建大橋。馬來西亞此舉並沒有考慮新加坡政府的立場，也沒有深入研究這項牽涉兩國的建橋決定，是否違反了國際海洋法的原則，以致新加坡政府感到「困惑」和「驚訝」。接著，兩國進行多次談判，新加坡提出向馬來西亞購買海砂及要求開放領空，以作為合作建橋的交換條件。最後，馬來西亞基於國家主權不容侵犯，於 2006 年 4 月，首相阿都拉取消興建美景大橋，並終止所有與新加坡的一切談判。

本研究選擇這段期間，主要是由於馬來西亞首先提出談判多年卻未落實的大橋工程。期間由於兩國兩代領導人交替，造成大橋工程曾經擱置兩年。之後，馬國衡量了經濟利益後，又重新啓動大橋工程和雙邊談判，最終卻在 3 個月後因無法答應新加坡提出的合作建橋條件，使建橋事件戲劇化地落幕。在宣布建橋、談判到取消興建的過程中，此事件無不涉及兩國的國家利益，不論是贊成或反對興建的各方，很明顯地都以國家利益為最關鍵的考量。

（三）報紙樣本

本研究將著重在馬新兩國媒體如何框架大橋課題。抽取的樣本包括馬來西亞的《星洲日報》及新加坡的《聯合早報》。馬來西亞的《星洲日報》是全國最大的中文報，每日銷量達 33 萬 9139 份，佔全國華文報總銷量的 12.9%，華人讀者人數全國居冠；新加坡只有 3 家中文媒體，其中《聯合早報》是唯一以大報形式出版的日報，日發行 18 萬份，另外兩份則多報導小道及八卦消息，不具任何代表性。基於上述原因，本研究選擇《星洲日報》及《聯合早報》作為研究樣本。

（四）新聞樣本

所選取的新聞以報導馬新大橋興建課題的純淨新聞為主，並不包括評論、社論、特稿、專題，以及公眾的回應文章。字數在 300 字以下的純淨新聞不包含在本研究範圍內。只要任何出現和大橋課題有關的新聞，都屬於本研究的新聞樣本。《星洲日報》新聞樣本的收集是在「舊聞搜尋」中鍵入關鍵字「大橋」，搜尋與馬新大橋有關的新聞；《聯合早報》樣本的收集則是在「聯合早報資料庫」裡的鍵入「大橋」搜索和馬新大橋有關的新聞。

王石番（1989）認為，對分析單位的選擇，必須同時兼顧其研究目的與效率。因此本研究選擇以「則數」，作為研究的分析單位。所謂一則新聞，是以新聞標題作為計算依據，一個新聞標題下有一篇署名或未署名新聞來源的報導，即稱之為一則新聞報導（梁慧玲，2004）。

（五）類目建構

壹、內容分析

1. 報紙名稱：新聞樣本是來自哪份報紙。

- (1) 星洲日報
- (2) 聯合早報

2. 日期：主要看新聞來自哪個月份。
3. 字數：300 字以下新聞，不包含在本研究範圍內。
4. 新聞報導地區：新聞起始列名的地區。
 - (1) 馬來西亞吉隆坡：馬來西亞首都，另外本研究也將行政中心布城，涵蓋在此類目中。
 - (2) 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山：和新加坡比鄰的城市，即興建馬新大橋的所在地。
 - (3) 新加坡
 - (4) 馬來西亞其他地區：消息來源在馬來西亞其他城鎮受訪的所在地。
5. 主要議題內容：單選，以內容主要議題為根據，或新聞首先強調的議題。
 - (1) 經濟（跳答 5.1）
 - (2) 外交（跳答 5.2）
 - (3) 大橋工程（跳答 5.3）
 - (4) 意見分歧：馬新對大橋課題的意見分歧（跳答 5.4）
 - (5) 民意：新聞內容主要為非政治人物以公眾利益為前提，提出觀點的報導。
 - (6) 背景資料：追溯建橋事件、談判過程等的背景報導。
 - (7) 環保：海水流通，改善海洋生態。
 - (8) 其他
 - (9) 國家主權：包含民族尊嚴。

5.1 經濟：複選。

- (1) 改善交通（舒緩長堤流量和新山市內交通）
- (2) 擴大腹地範圍（貫通機場和港口）
- (3) 有助航運業發展（建立新碼頭，方便船隻川行，縮短航程）
- (4) 城市綜合發展（增加就業機會、國家收入，土地增值，旅遊業和建築業）
- (5) 舊長堤和第二通道仍有經濟價值
- (6) 浪費資源和金錢（拆除長堤和建造新橋）
- (7) 影響旅遊業發展（遊客減少）
- (8) 影響港務業、航空業和商業
- (9) 其他

5.2 外交：複選。

- (1) 雙邊關係（對鄰國表示善意、尊重，表達對鄰國的原則，討論雙邊關係的惡化或好轉，對雙邊關係的態度，雙邊課題會否影響雙邊關係）
- (2) 課題談判（針對雙邊課題的談判日期敲定、細節、內容、過程、進程、成果、支持協商等，不具分歧點）

5.3 大橋工程：複選。

第五屆世界華文傳媒與華夏文明傳播學術研討會（台北 2007）

- (1) 大橋工程／進度
- (2) 大橋相關建築物工程／進度
- (3) 大橋相關基礎設施／交通工程（道路、火車軌道、水管、高架天橋）
- (4) 建橋資金／建築費
- (5) 大橋的建築設計
- (6) 建橋工程擱置
- (7) 巡視大橋工程
- (8) 取消建橋或賠償細節
- (9) 大橋建設的安全問題
- (10) 單方面建橋的法律問題
- (11) 其他

5.4 意見分歧：複選。（以馬國角度）

- (1) 馬國計畫興建大橋（新國反對）
- (2) 馬國計畫拆除舊長堤（新國反對）
- (3) 馬國將大橋課題抽離配套談判（新國堅持配套談判）
- (4) 雙方指責對方對此課題或談判的立場（雙方反駁指責）
- (5) 馬國不願開放領空和賣沙（新國以此為建橋交換條件）
- (6) 其他

6. 次要議題內容：單選，和上一小題相同，用於檢視是否同一篇新聞出現一個以上的議題內容。

貳、內容主角

7. 共有多少消息來源：

- (1) 1 位
- (2) 2 位
- (3) 多位
- (4) 沒有消息來源（跳答 12）

8. 主要消息來源：新聞內容主要引述的部門或相關人物。

- (1) 馬來西亞中央政府：首相、副首相、首相署。
- (2) 馬來西亞州政府：州務大臣（以柔佛州為主）。
- (3) 馬來西亞政府部門：包括內閣部長，以及各政府部門，如港務局、工程局等的官員。
- (4) 馬來西亞外交部：包括外交部長。
- (5) 馬來西亞政治人物：包括國會議員、州議員、執政政黨團成員。
- (6) 馬來西亞反對黨：包括反對黨成員。
- (7) 馬來西亞大橋承建公司：包括南方門戶有限公司（Gerbang Perdana）的發言人、工程師。
- (8) 馬來西亞民眾：包括非政府部門的專業人士，及市井小民。

- (9) 新加坡政府：包括總理和以政府名義發言的政府官員。
- (10) 新加坡外交部：包括外交部長。
- (11) 新加坡反對黨：包括反對黨成員。
- (12) 新加坡民眾：包括非政府部門的專業人士，及市井小民。
- (13) 其他報章報導
- (14) 其他

9. 消息來源表達的立場：

- (1) 宣佈興建大橋
- (2) 支持興建大橋
- (3) 不支持興建大橋
- (4) 宣佈取消興建大橋
- (5) 支持取消興建大橋
- (6) 不支持取消興建大橋
- (7) 中立
- (8) 未提及
- (9) 其他

10. 次要消息來源：和上一小題相同，用於檢視是否同一篇新聞出現一個以上的消息來源。

11. 次要消息來源表達的立場：和上一小題相同，用於檢視是否同一篇新聞出現一個以上的消息來源立場。

參、新聞偏向

12. 媒體立場：

- (1) 馬來西亞：新聞內容較偏向馬來西亞。
- (2) 中立：新聞內容沒有任何立場，或平衡報導。
- (3) 新加坡：新聞內容較偏向新加坡。

13. 新聞內容是否支持馬來西亞政府的決定：

- (1) 支持
- (2) 中立
- (3) 不支持

14. 新聞內容是否支持新加坡政府的決定：

- (1) 支持
- (2) 中立
- (3) 不支持

15. 新聞報導立場：新聞內容對贊成建橋的立場與支持政府的決定，所發出的訊息是否正面。

- (1) 正面（贊成）
- (2) 中立
- (3) 負面（不贊成）
- (4) 無法判斷

16. 平衡報導

- (1) 報導內容以支持本國為主
- (2) 報導內容對兩國陳述之字數均等
- (3) 報導內容以反駁鄰國指責為主
- (4) 不適用
- (5) 無法判斷

肆、新聞框架

17. 新聞框架：內容整體上以何種角度框架新聞。

- (1) 經濟：內容提及與國家利益相關、牽涉建橋利弊、建築工程的報導。
- (2) 政治：內容以國家為主，如政府立場、維護國家的政治性報導。
- (3) 外交：內容提及兩國之間的關係、雙邊談判、對對方國家的看法屬此類目。
- (4) 其他

18. 此框架屬：（以馬國角度）

- (1) 正面（有利馬國）
- (2) 中立
- (3) 負面（不利馬國）
- (4) 無法判斷

19. 新聞框架功能：新聞內容以上述角度框架，所取得的效果。

- (1) 引導民意
- (2) 鞏固政府立場
- (3) 反駁與己方意見不合者
- (4) 其他

20. 新聞框架手法：新聞主要以何種手法展開內容。

- (1) 記者會陳述：以官員或政治人物召開記者會發布的陳述為主導框架。
- (2) 受訪陳述：以官員或政治人物受詢時的陳述為主導框架。
- (3) 議題事件：以議題或事件為主導框架。
- (4) 人民意見：以人民意見為主導框架。
- (5) 文告陳述：以消息來源發出的文告為主導框架。
- (6) 言論發表：以官員或政治人物出席活動時，發表的言論為主導框架。
- (7) 其他

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新聞則數與報導地區的分佈

本研究分析 2003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4 月 15 日期間共 234 則新聞。從各報新聞則數的分布看來，馬來西亞對大橋課題的關注顯然較新加坡為多。馬來西亞報章《星洲日報》的報導量佔了 62.4%，新加坡報章《聯合早報》只有 37.6%，數量差距很大。從新聞則數的處理來看，可看出各國媒體立場與國家立場是相輔相成，互相呼應的。馬來西亞政府自 2003 年 1 月開始宣布，即使新加坡不同意，馬國政府堅持單方面興建大橋，當地的《星洲日報》也隨之呼應，頻頻報導與大橋課題相關的消息，以在國內製造輿論氣氛。而新加坡基於興建大橋對她毫無好處，弊多於利，港務業和經濟發展反而恐受影響，因此一直不贊成興建大橋，對大橋課題採取冷處理的手法，並不積極報導，顯然不希望民眾對此議題有太多的議論。由於新加坡立場與馬國相反，這同時反映在兩國媒體新聞報導的則數上。

表 4.1 報章新聞則數分布

報紙名稱	次數	百分比
星洲日報	146	62.4
聯合早報	88	37.6
總和	234	100.0

從新聞報導地區的百分比（表 4.2）顯示，出自新加坡有關大橋課題的新聞只有 16.7%，分別比馬來西亞吉隆坡和柔佛州新山的新聞則數少，而且是建橋地點新山新聞則數的一半。而吉隆坡和新山新聞則數的總和超過所有新聞的一半，為 74.3%。數據顯示新加坡官方或民間皆較少談論大橋課題，而在馬來西亞，尤其是吉隆坡和柔佛州新山，大橋課題佔據了多數版位，成為當時的主要議題。

而進一步報紙名稱和新聞報導地區的百分比（表 4.3）顯示，《聯合早報》出自新加坡的新聞佔了 37.5%，其次是引述來自吉隆坡的新聞，佔 36.4%，來自這兩地的新聞則數可說相當平均。不過，如果加上《聯合早報》引述新山和馬國其他地區的新聞則數，全部就佔了 62.5%，這顯示超過半數的新聞來自馬來西亞。這數據歸咎於新加坡政府不願對大橋課題發表過多言論，以致《聯合早報》大多引用發自吉隆坡的新聞，讓民眾約略了解鄰國對於此課題的事態發展，而並沒有隨《星洲日報》那般大肆報導，符合了國家冷處理的立場。而馬來西亞與新加坡抱持相反立場，一直積極報導大橋課題，以取得民眾的支持和認同，來自馬來西亞各地的新聞報導佔了《星洲日報》總新聞數的 95.9%，來自新加坡的新聞只有 4.1%。從數量上看，《星洲日報》的報導顯著不平衡。

表 4.2 新聞報導地區新聞則數分布

新聞報導地區	次數	百分比
馬來西亞吉隆坡	96	41.0
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山	78	33.3
新加坡	39	16.7
馬來西亞其他地區	21	9.0

總和	234	100.0
----	-----	-------

表 4.3 報紙名稱和新聞報導地區的百分比分布

報紙名稱	報紙名稱		總和
	星洲日報	聯合早報	
吉隆坡	64 43.8%	32 36.4%	96 41.0%
新山	61 41.8%	17 19.3%	78 33.3%
新加坡	6 4.1%	33 37.5%	39 16.7%
馬其他地區	15 10.3%	6 6.8%	21 9.0%
總和	146 100%	88 100%	234 100%

根據McQuail，發展理論是分析經歷從不發達和殖民主義向獨立和更好的物質條件轉變的社會。儘管不同社會的大眾傳媒機構有著相似之處，但就起源、實踐和慣例來說，傳媒是非常國家性的機構，它們感受到國內政治和社會的壓力，並對受眾期望作出反應。它們反映、表達「國家利益」，有時還主動為「國家利益」服務。（D. McQuail, 1996）。而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都曾經是英殖民地，於近代才獨立，媒體的角色必須是維護國家利益，表達國家政策，與政府的關係是良好的夥伴關係。因此，在涉及國家利益的雙邊課題上，這兩份報紙的表現明確地展示了發展傳媒理論的觀點，即馬來西亞希望能夠建設新大橋，不斷向媒體放話，以在馬國社會製造不滿新加坡政府的情緒化反應，《星洲日報》於是跟著報導來自政府官員的聲音，出現大量報導與大橋課題有關的新聞；而新加坡認為興建大橋對本身利益不大，《聯合早報》跟隨國家立場，對大橋新聞採取冷處理的手法。

第二節 雙邊大橋課題的新聞主題在兩國報紙的呈現

根據表 4.4 顯示，外交和大橋工程的報導是則數佔了超過一半的主議題內容，百分比為 82.1%，顯示兩份報紙對雙邊關係和課題談判，以及涉及經濟支出的建橋工程都甚為重視。數據顯示，關乎國家立場和國家利益的新聞主題，皆受到媒體較大篇幅的報導。其次是意見分歧和經濟，百分比各佔 6%和 4.7%。

從表 4.5 的次議題內容來看，外交和意見分歧佔了較多百分比，分別為 14.1%和 13.7%，顯示雙邊關係和課題談判仍然是兩份報紙所強調的內容。而兩國爭論不休的分歧點，大多置放在次要議題，通常和外交有關的議題相結合，以表示兩國的不同立場。而經濟議題並沒有佔據新聞報導的大部分，經濟在主議題和次議題的百分比上，均只有 5%左右的報導量。雖然大橋課題對兩國經濟帶來影響，也左右著

國家對於建橋或不建橋的立場，但兩國報紙的報導重點顯然放在有關雙邊課題和大橋工程的討論上。

表 4.4 主議題內容百分比

主議題內容	次數	百分比
經濟	11	4.7%
外交	101	43.2%
大橋工程	91	38.9%
意見分歧	14	6.0%
民意	7	3.0%
背景資料	3	1.3%
環保	4	1.7%
其他	2	0.9%
國家主權	1	0.4%
總和	234	100.0%

表 4.5 次議題內容百分比

次議題內容	次數	百分比
經濟	16	6.8%
外交	33	14.1%
大橋工程	27	11.5%
意見分歧	32	13.7%
民意	2	0.9%
背景資料	17	7.3%
環保	5	2.1%
其他	18	7.7%
國家主權	4	1.7%
總和	154	65.8%

而根據表 4.6，主議題內容和報紙名稱進一步的交叉比較顯示，《聯合早報》所有有關大橋課題的報導中，外交議題佔了最多百分比，即 54.5%，其次為佔 33% 的大橋工程，顯示新加坡方面對外交和工程這兩個議題的關注度最高。而《星洲日報》主議題內容的首兩個議題排序，恰好和《聯合早報》相反，大橋工程是《星報》較關注的新聞議題，佔 42.5%，外交議題則只有 36.3%。數據顯示《聯合早報》較重視外交議題。在與馬國洽談大橋課題的雙邊談判上，由《聯合早報》呈現的議題內容報導量來看，顯示新加坡較為重視雙邊關係和課題談判，而不是建設大橋的工程進展。相反地，由於馬國極力爭取興建大橋，且開始動工，關於建築費、相關建築物、基礎建設、建築設計、建橋的法律問題和賠償細節等，才是《星洲日報》關注的課題，與新加坡的雙邊關係反而是其次。對大橋工程的大量報導，顯示馬國報紙對這個議題的重視程度，不似新加坡報紙那麼顯著地著重在雙邊關係的報

導上。從兩國報紙對主要議題內容的報導量來說，可看出兩國媒體對不同主題的關注程度，從中反映各國立場，顯然各國媒體與國家立場及國家利益是相契合的。

此外，在經濟議題上，由於興建大橋對馬國好處甚多，於新加坡則沒有太大的好處，以致《聯合早報》對於經濟議題的報導較少，再一次證明報紙報導內容在涉及與國家利益相關的議題上，會與國家立場一致。

表 4.6 主要議題內容和報紙名稱的交叉分析表

主議題內容	報紙名稱		總和
	星洲日報	聯合早報	
經濟	8 5.5%	3 3.4%	11 4.7%
外交	53 36.3%	48 54.5%	101 43.2%
大橋工程	62 42.5%	29 33.0%	91 38.9%
意見分歧	10 6.8%	4 4.5%	14 6.0%
民意	4 2.7%	3 3.4%	7 3.0%
背景資料	2 1.4%	1 1.1%	3 1.3%
環保	4 2.7%	0 0%	4 1.7%
其他	2 1.4%	0 0%	2 0.9%
國家主權	1 0.7%	0 0%	1 0.4%
總和	146 100%	88 100%	234 100%

由於《聯合早報》有引述來自馬來西亞的新聞，因此本研究進一步以主要議題內容和新聞報導地區作交叉比較，並將馬來西亞各地區合併為「馬來西亞」，以與新加坡作顯著的對比。表 4.7 顯示，發自新加坡的新聞報導主要內容上，外交議題佔了超過半數的報導量，百分比為 61.5%。而有關大橋工程的議題其實只佔了 12.8%，顯示《聯合早報》刊登的有關大橋工程的新聞多引述自馬來西亞的報紙。這可能是因為大橋工程並沒有在新加坡領土動工，因而造成大量的引述新聞。另一方面，從表 4.7 顯示，發自新加坡的新聞量非常少，其中大部分主要報導外交議題，顯示新加坡政府對於雙邊關係和課題談判較為重視，這和表 4.6 的分布狀況相似。其餘有關大橋課題的議題並沒有主動觸及報導，只是轉載馬國報章的新聞，讓

民眾了解工程的進展，除了因為工程不在新加坡領土展開外，也由此顯示新加坡政府不贊同興建大橋的立場，只有關係到國家利益和雙邊利益的外交談判，新加坡才主動報導，因此如表 4.7 顯示的，表達對鄰國態度的雙邊關係議題和交代外交談判進程的議題成了《聯合早報》主要報導的議題內容。

在馬來西亞方面，主要議題內容的百分比分布大致上和報紙名稱的分布相似，即《星洲日報》著重報導大橋工程和外交議題，發自馬來西亞的新聞議題也以外交和大橋工程為主，就連百分比分布也相當接近。就報導地區來看，發自馬來西亞的新聞和《星洲日報》重視的議題相契合，顯示《星洲日報》作為親官方的媒體，與國家利益和立場較為一致。而《聯合早報》在對外的雙邊關係上，也和國家利益和立場的步伐一致。

表 4.7 主要議題內容和新聞報導地區的交叉分析表

主議題內容	新聞報導地區		總和
	馬來西亞	新加坡	
經濟	8 4.1%	3 7.7%	11 4.7%
外交	77 39.5%	24 61.5%	101 43.2%
大橋工程	86 44.1%	5 12.8%	91 38.9%
意見分歧	10 5.1%	4 10.3%	14 6.0%
民意	5 2.6%	2 5.1%	7 3.0%
背景資料	2 1.0%	1 2.6%	3 1.3%
環保	4 2.1%	0 0%	4 1.7%
其他	2 1.0%	0 0%	2 0.9%
國家主權	1 0.5%	0 0%	1 0.4%
總和	195 100%	39 100%	234 100%

在次要議題內容方面，發自新加坡的議題內容仍然集中在外交議題上，另外和馬國在大橋課題上的意見分歧也佔了相當的數量，和外交議題一樣，百分比為 29.6%。新加坡政府依然著重在與馬來西亞討論的雙邊課題談判上，並站在維護國家利益的立場上，堅持本國立場。新加坡政府對鄰國的外交態度顯示在次要議題內容的外交議題和意見分歧方面。以下新聞為例：

「從經濟立場來看，興建新馬大橋對新加坡來說弊多於利。新加坡基於雙邊合作及配套談判原則，而支持建造新馬大橋。既然馬來西亞抽出配套談判，就等同放棄新加坡的支持。（聯合早報，2003.2.25）」

上述的新聞例子顯示新加坡本著興建大橋對國家利益沒有好處為立場，和馬來西亞談判，當發生意見分歧時，即馬來西亞將大橋課題抽離配套談判，新加坡堅持配套談判的情況發生，新加坡政府為維護本國利益，堅持外交立場與原則，即不支持興建大橋。還有以下新聞顯示新加坡政府的外交立場：

「對於馬來西亞當局決定取消穹橋建造計畫，吳資政（新加坡資政吳作棟）昨天表示『意外』，但是認為這不應該影響新馬關係。他強調，兩國的交往必須建立在『利益平衡』的基礎上。（聯合早報，2006.4.15）」

由於新加坡政府強調的是與馬來西亞的雙邊關係和外交談判，一旦無法達到兩國利益平衡，而發生意見分歧時，也是新加坡方面向媒體表達國家立場，同時通過媒體向人民傳達政府原則的時候。這顯示兩國對同一大橋課題的討論上，新加坡較馬來西亞著重外交談判和雙邊關係。這在主要和次要議題內容的數據上都很明顯地顯示出來。

而發自馬來西亞的次要議題內容，在新聞數量上，則在外交議題、大橋工程和意見分歧方面平均分布，顯示馬來西亞皆同樣重視這三項議題。而在經濟議題方面，馬來西亞顯然較為強調。和新加坡有關經濟議題的則數比較，馬來西亞方面有 14 則，新加坡方面僅有 2 則，在百分比方面，馬來西亞也比新加坡為多，顯示大橋的興建對馬來西亞帶來的利益較為顯著，引起報紙的重視和關注。而興建大橋帶給新加坡的經濟利益較少，也造成媒體少量的報導。

表 4.8 次要議題內容和報導地區的交叉分析表

次議題內容	新聞報導地區		總和
	馬來西亞	新加坡	
經濟	14 11.0%	2 7.4%	16 10.4%
外交	25 19.7%	8 29.6%	33 21.4%
大橋工程	24 18.9%	3 11.1%	27 17.5%
意見分歧	24 18.9%	8 29.6%	32 20.8%
民意	2 1.6%	0 0%	2 1.3%
背景資料	14 11.0%	3 11.1%	17 11.0%
環保	5	0	5

	3.9%	0%	3.2%
其他	17	1	18
	13.4%	3.7%	11.7%
國家主權	2	2	4
	1.6%	7.4%	2.6%
總和	127	27	154
	100%	100%	100%

傳媒在國家的限制和軍事的監督下，在報導國際糾紛時，與國家抱持相同價值觀和常規，因此，傳媒跟隨國家的步伐，在戰爭宣傳上成為自願同謀（willing accomplices），並可能在煽動爭端方面扮演顯著的角色。新聞不是爭端的簡單反映，反而是媒體為社會大眾對爭端的形塑。媒體的詮釋和訊息的框架是建構在與閱聽人相似的文化情境中。和國家擁有共同的政治經濟理念的媒體，會以相同的方式框架國際新聞（Maslog, Lee & Kim, 2006）。

同樣在詮釋國與國之間的雙邊爭議時，兩國報紙主動跟隨國家領導人的立場和原則，以相同的方式框架雙邊課題新聞。兩國報紙選擇大量報導，重視和關注的議題大致上和國家領導人所抱持的立場相符合。從上述表格看來，新加坡較為注重外交議題，而馬來西亞較注重大橋工程，相對應的兩國報紙，也分別著重報導這兩項議題。

第三節 兩國報章就新聞偏向呈現的差異性

本研究欲探討在涉及關係到兩國利益的課題時，媒體立場是否也和國家一樣，採取相同的立場，以達到發展傳媒理論強調的，媒體會主動反映、表達國家利益，甚至為「國家利益」服務。根據 Wong（2004）認為，政府會以一價值觀為核心，強調媒體和政府的夥伴關係，借此要求媒體跟著國家經濟發展的步伐，作出有利國家發展的報導。由此可見，在經歷過被殖民統治的時代，爭取國家獨立的艱辛過程後，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通常必須以弱者的姿態在國際上生存，國內經濟生產、公共建設等有關國家議題方面，都極力需要媒體在背後的支持，製造與政府相同步調的輿論，並以政府擁護的核心價值觀為主導，來達到明確表達與反映政府政策或政府立場，使民眾不自覺地將核心價值觀自我內化，進一步倒向政府一方，達致全體民眾支持政府決策，維護國家立場的效果。上述數據的比較也說明了媒體立場和國家立場的一致性。

從新聞偏向的角度來看，由表 4.9 報紙名稱和媒體立場的交叉分析顯示，《星洲日報》支持所在地國家馬來西亞的百分比超過半數，達 84.2%，而支持新加坡的只有 2.7%。相反地，《聯合早報》也較為支持新加坡，百分比為 31.8%，不過保持中立的百分比，佔了 63.6%。而《聯合早報》支持馬來西亞的百分比為 4.5%，看起來較《星洲日報》支持新加坡的百分比為多，可是在新聞則數上，雙方都只有 4 則，因此在支持對方國家立場的新聞數量上還是一樣的。至於《聯合早報》支持中立立場的新聞數量較支持新加坡的新聞數量還多的原因，主要是由於《聯合早報》

第五屆世界華文傳媒與華夏文明傳播學術研討會（台北 2007）

的新聞有相當多是轉述自馬來西亞，而對這些新聞多採取中立立場，才會出現百分比比較支持新加坡立場為多的情況。

表 4.9 報紙名稱和媒體立場的百分比分布

報紙名稱	媒體立場			總和
	馬來西亞	中立	新加坡	
星洲日報	123	19	4	146
	84.2%	13.0%	2.7%	100%
聯合早報	4	56	28	88
	4.5%	63.6%	31.8%	100%
總和	127	75	32	234
	54.4%	32.1%	13.7%	100%

由表 4.10 針對報紙名稱和對馬來西亞支持與否的交叉分析看來，結果和上述分析一樣，《星洲日報》大幅度地表達支持立場，明顯地支持所在地政府，百分比佔 76.0%，不支持的百分比只有 5.5%。而《聯合早報》有 25.0%表示不支持馬來西亞政府。此外，《聯合早報》有 59.1%持中立立場，原因也是因為多為轉引自馬來西亞的新聞，卻對這些新聞不抱支持態度，因而採取中立立場。

表 4.10 報紙名稱和支持馬來西亞政府決定的百分比分布

報紙名稱	支持馬來西亞政府決定			總和
	支持	中立	不支持	
星洲日報	111	27	8	146
	76.0%	18.5%	5.5%	100%
聯合早報	14	52	22	88
	15.9%	59.1%	25.0%	100%
總和	125	79	30	234
	53.4%	33.8%	12.8%	100%

表 4.11 報紙名稱和支持新加坡政府決定的百分比分布

報紙名稱	支持新加坡政府決定			總和
	支持	中立	不支持	
星洲日報	6	100	40	146
	4.1%	68.5%	27.4%	100%
聯合早報	27	56	5	88
	30.7%	63.6%	5.7%	100%
總和	33	156	45	234
	14.1%	66.7%	19.2%	100%

而表 4.11 有關報紙名稱和支持新加坡與否的交叉比較中，《聯合早報》和《星洲日報》的百分比分布恰巧呈現相反分布。《星洲日報》不支持新加坡的百分比達 27.4%，而《聯合早報》支持新加坡的百分比有 30.7%，百分比分布相當一致；兩份報紙在對新加坡政府的支持立場上，都很有共識地大量保持中立立場，百分比都超過半數。另外《星洲日報》支持新加坡政府和《聯合早報》不支持新加坡政府的百分比也非常接近，顯示兩份報紙站在所在地國家的立場上，對鄰國或本國保持的支持態度和國家相當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的《聯合早報》在表 4.10 上支持馬來西亞政府的百分比達 15.9%；馬來西亞的《星洲日報》在表 4.11 上支持新加坡政府的百分比只有 4.1%，這數據顯示新加坡較容許國內媒體在報導雙邊課題上，站在鄰國立場刊登新聞。而《星洲日報》則較傾向站在所在地國家的立場報導與刊登新聞，同時大量保持中立。

《聯合早報》在引述發自馬來西亞的新聞時，大多和馬來西亞報章原本的新聞相似，以致出現支持馬來西亞政府的數量較《星洲日報》支持新加坡的新聞數量為多。而且，《聯合早報》刊登的一些新聞是將政治人物的講話全文一併刊登在報紙上，並沒有記者出席活動後，根據報章立場予以個人的詮釋，此舉目的是讓民眾自行分辨有關人物或課題，符合新加坡凡事講求法律及證據的務實精神，這與新加坡一貫奉行的政治文化相一致。以下新聞標題為例：

「我敢向上蒼發誓，我沒說騙話……——馬哈迪在新山主持動土禮上講話全文（聯合早報，2003.2.15）」

當與馬來西亞發生爭議時，《聯合早報》也刊登新加坡政治人物的說話全文，並強調以正視聽，顯示報章抱著中立的態度，忠實地刊登新聞，讓人民自行分辨誰是誰非，借此達到引導民意的功能。以下新聞摘錄為例：

「新加坡外交部為此特地全文引述楊榮文（新加坡外交部長）當天在國會上的談話摘錄，重申我國對建橋課題所持的一貫立場，以正視聽（聯合早報，2006.3.6）。」

雖然《聯合早報》比較容許刊登鄰國立場的新聞，但從上述摘錄的新聞來看，媒體的功能還是為國家機構服務的。正如 Wong（2004）所強調的，經歷過英殖民時代的新加坡，在獨立建國的過程中，媒體扮演著表達國家利益及政策的角色。政府以「亞洲價值觀」為核心，強調媒體和政府的夥伴關係（media-government partnership），媒體必須服膺於國家經濟發展的步調，作出對國家經濟有利的報導，以教育和動員大眾對國家作出貢獻。媒體的角色就是扮演國家的發聲筒，在與鄰國發生爭議時，刊登政府的立場，以達到教育人民，讓人民了解國家政策及原則的目的，而媒體在選擇新聞刊登時，也與國家政策及目的保持一致。

由表 4.12 關於報紙名稱和新聞報導立場來看，看出《星洲日報》和《聯合早報》對於政府的決定都抱著正面的態度，抱持負面態度的百分比都相對非常少。這顯示兩份報章對於政府決策表達不滿或不支持的負面態度都相當一致，並不會對所在地政府表達否定的意見。而《星洲日報》對於建橋決定以及政府決定採取正面報導方式，與表 4.9 和表 4.10 支持所在地政府的百分比相近。

表 4.12 報紙名稱和新聞報導立場的百分比分布

報紙名稱	新聞報導立場				總和
	正面	中立	負面	無法判斷	
星洲日報	107 73.3%	23 15.7%	12 8.2%	4 2.7%	146 100%
聯合早報	37 42.0%	49 55.7%	2 2.3%	0 0%	88 100%
總和	144 61.5%	72 30.8%	14 6.0%	4 1.7%	234 100%

以上有關測量兩分報紙新聞偏向的數據和列表顯示，媒體會很自然地服膺於國家的立場、決策、經濟發展等的步調，顯然扮演著為國家政府服務的機器。根據張威和周秀芳（2001）對新加坡媒體的研究發現，新加坡積極推行國家政治一體化，並利用媒體向民眾傳達與分析政府的政策與措施，把肯定國家的利益、社會整體的利益和報業本身利益結合，不允許任何個人或集團利益，損害國家利益。

這和新加坡採取的管制媒體措施有關，新加坡政府早年將原本屬於私人經營的報章，合併為《聯合早報》，就如學者認為，合併舉措的背後，隱藏著深刻的政治原因，合併顯然是為了進一步控制報紙和輿論，新加坡政府在政治上一直對新聞界實行控制（張威和周秀芳，2001）。

而 Wong（2004）也提到，馬新兩國皆提倡「亞洲價值觀」，強調家庭、社區、集體共識，皆排在個人利益之上。維護整體社會和國家的利益是全體國民所應抱持的集體意識型態，包括國內的各個傳媒。媒體必須扮演執政黨的喉舌，以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協助經濟成長與發展，共同維護集體利益，馬新兩國作為曾被殖民統治的新興國家，都體現了發展傳媒理論的觀點（Wong, 2004）。由此，在國家利益至上的意識型態下，這兩家報章的立場也明顯地倒向所在地國家，甚至支持所在地國家所作的任何決定，並將媒體集團的「個人」利益降到最低，一切皆以國家利益為主，同時與政府採取相同的立場。

第四節 兩國報章就新聞框架呈現的差異性

從表 4.13 關於新聞框架和報紙名稱的交叉比較來看，雖然兩份報紙在經濟和外交的框架角度都大量分布，但就個別報章的框架角度看來，《聯合早報》很明顯地著重在外交方面，百分比超過半數。這顯然與新加坡政府的立場有相當大的關係。由於新加坡當局並不願興建大橋，因此對於大橋的興建絲毫不感興趣，而這個立場也呈現在新聞報導上。新加坡是因為馬來西亞決定興建大橋，才願意與馬國商談相關大橋事宜，新聞報導的焦點多集中在與馬國的談判進展、細節、條件，以及兩國的雙邊關係上。這也因此造成《聯合早報》在框架大橋課題上，大量地以外交角度為框架。以下新聞顯示《聯合早報》多報導外交談判進展和雙邊關係：

「吳作棟總理昨天針對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上星期五無理指責新加坡的尖酸言論作出回應時，形容馬哈迪是個『編故事的能手』。總理強調，事實是他對馬國所提出的建造新馬大橋，以取代新柔長堤的計畫所持的立場，一直是把這當成包括水供協定在內的雙邊談判配套的一部分來談判。他指出，既然馬國現在已經單方面決定將談判配套打散，只願單獨談判水供課題，在這樣的情況下，新加坡也不能夠同意馬國建造大橋的建議。……（吳總理）始終是心平氣和地針對馬哈迪的言論和新馬雙邊課題發表看法。」

另外，在與馬來西亞進行大橋課題談判上，有關經濟的因素也左右新加坡政府的立場。表 4.13 顯示，《聯合早報》以經濟為框架的新聞量有 34.1%，僅次於外交框架。經濟框架主要和大橋工程有關聯，新聞主要討論大橋工程能夠為新加坡帶來哪些利弊，此外，有關大橋工程的訊息也置放在經濟框架中，工程所需的建築費，新加坡需承擔的建築費用，也包含在經濟框架內。由於有關大橋的工程無論在工程本身或工程引起的發展影響，都與國家利益相關，因此注重「利益平衡」的新加坡，其國內報章《聯合早報》也著重以經濟角度框架新聞。

而在《星洲日報》方面，框架角度的排序也和《聯合早報》一樣，多以經濟和外交為框架。不過，所不同的是，《星洲日報》並沒有大量以外交角度為框架，反而和經濟框架的百分比相近，都是在 45% 左右，沒有壓倒性地超過半數。這顯示《星洲日報》對這兩方面的關注程度不分軒輊，幾乎達到平衡的框架。但從排序上看，《星洲日報》顯然還是較著重外交框架，政治人物為了爭取民眾支持建橋計畫，在外交上和新加坡談判時，頻頻發表有關政府決策的言論，以鞏固政府立場，加強繼續建橋工程的合理性，並引導民意。而以經濟為框架則是交代興建大橋都對國家經濟和港務業發展有何幫助，同時有大量的新聞是告知人民建橋工程的花費等相關經濟及財務上的細節。

表 4.13 新聞框架和報紙名稱的百分比分布

新聞框架	報紙名稱		總和
	星洲日報	聯合早報	
經濟	65 44.5%	30 34.1%	95 40.6%
政治	8	1	9

第五屆世界華文傳媒與華夏文明傳播學術研討會（台北 2007）

	5.5%	1.1%	3.8%
外交	66	57	123
	45.2%	64.8%	52.6%
其他	3	0	3
	2.1%	0%	1.3%
環保	4	0	4
	2.7%	0%	1.7%
總和	146	88	234
	100%	100%	100%

由表 4.14 有關新聞框架功能和報紙名稱的百分比分布來看，《聯合早報》超過半數的新聞量的框架功能是引導民意，百分比為 62.5%。而在有關新聞框架手法的表 4.15 中，《聯合早報》通過受訪陳述的框架手法所取得新聞量的百分比為 40.9%，是所有框架手法內百分比最高的。這顯示《聯合早報》所刊登的新聞大多為消息來源受訪的陳述，而消息來源也借媒體這個管道，來達到引導民意的作用。

在《星洲日報》方面，引導民意和鞏固政府立場都佔相當多的百分比，分別為 52.7%和 34.9%，以期民眾在政府的建橋決策上，能夠獲得人民的集體支持。而根據表 4.15，《星洲日報》主要採用記者會陳述、受訪陳述、言論發表這三種框架手法。從《星洲日報》所採用的框架手法來看，通過這三種方式，報章藉由詢問消息來源或引述消息來源的談話，來達到引導民意和鞏固政府立場的目的。與《聯合早報》一樣，受訪陳述佔所有框架手法的最大量，達 37.0%。

表 4.14 新聞框架功能和報紙名稱的百分比分布

新聞框架功能	報紙名稱		總和
	星洲日報	聯合早報	
引導民意	77	55	132
	52.7%	62.5%	56.4%
鞏固政府立場	51	17	68
	34.9%	19.3%	29.1%
反駁與己方意見不和者	7	9	16
	4.8%	10.2%	6.8%
其他	11	7	18
	7.5%	8.0%	7.7%
總和	146	88	234
	100%	100%	100%

表 4.15 新聞框架手法和報紙名稱的百分比分布

第五屆世界華文傳媒與華夏文明傳播學術研討會（台北 2007）

新聞框架手法	報紙名稱		總和
	星洲日報	聯合早報	
記者會陳述	40 27.4%	9 10.2%	49 20.9%
受訪陳述	54 37.0%	36 40.9%	90 38.5%
議題事件	16 11.0%	18 20.5%	34 14.5%
人民意見	0 0%	6 6.8%	6 2.6%
文告陳述	7 4.8%	7 8.0%	14 6.0%
言論發表	29 19.9%	12 13.6%	41 17.5%
總和	146 100%	88 100%	234 100%

$X^2=23.443, p=.000, <.001$

由上述數據和列表顯示，兩國報紙採取差異的框架來報導同樣的大橋課題。根據林靜伶（1999: 529）所提到的定義，框架為意念的再現，而意念是人們對外在世界的思考，就新聞框架再現的意念而言，意念的來源除了事件本身外，新聞專業意理、編輯室文化、社會文化、政治意識形態等都可能是意念的來源。因此，兩國報紙框架的異同，也分別受到各國不同的社會文化、政治意識影響，並進一步影響新聞專業意理和編輯室文化，以致兩國報章的框架呈現相當程度的差異性。

第五節 主要消息來源的分布

由上述的表 4.1 顯示，兩份報紙在報導的數量上有很大的差別。這表示兩國對大橋課題的關注程度有很大的差異，也影響兩國對大橋課題的框架。同樣的情形也顯示在消息來源上。新加坡政府和外交部以及民眾只佔了總百分比的 12.4%，其餘消息來源多來自馬來西亞的中央政府、政府官員及各階級黨團的政治人物。如果單純以兩國外交部作為消息來源的次數來比較，馬來西亞的外交部佔了 16.2%，也比新加坡外交部的 4.3% 多了接近 4 倍。這顯示在新加坡政府不願參與建橋計畫的情況下，媒體也跟隨政府的腳步，儘量減少報導有關新聞，以免在民眾之中形成有關輿論。

表 4.16 主要消息來源的百分比分布

主要消息來源	次數	百分比
馬中央政府	44	18.8
馬州政府	19	8.1
馬政府部門	26	11.1
馬外交部	38	16.2

馬政治人物	30	12.8
馬反對黨	5	2.1
馬大橋承建公司	13	5.6
馬民眾	9	3.8
新政府	11	4.7
新外交部	10	4.3
新民眾	8	3.4
其他報章報導	5	2.1
其他	1	0.4
沒有消息來源	15	6.4
總和	234	100.0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一共提出三個研究問題，在本章中試圖回答以下研究問題：

1. 馬新報章在新聞議題內容上，如何框架大橋課題的報導？

外交和大橋工程的報導是則數佔了馬新兩份報紙超過一半的主議題內容，顯示兩份報紙對雙邊關係和課題談判，以及涉及經濟支出的建橋工程都甚為重視。數據顯示，關乎國家立場和國家利益的新聞主題，皆受到媒體較大篇幅的報導。而在次議題內容來看，外交和意見分歧佔了較多百分比，顯示雙邊關係和課題談判仍然是兩份報紙所強調的內容。而兩國爭論不休的分歧點，大多置放在次要議題，通常和外交有關的議題相結合，以表示兩國的不同立場。

在與馬國洽談大橋課題的雙邊談判上，由《聯合早報》呈現的議題內容報導量來看，顯示新加坡較為重視雙邊關係和課題談判，而不是建設大橋的工程進展。相反地，由於馬國極力爭取興建大橋，且開始動工，關於建築費、相關建築物、基礎建設、建築設計、建橋的法律問題和賠償細節等，才是《星洲日報》關注的課題，與新加坡的雙邊關係反而是其次。

對大橋工程的大量報導，顯示馬國報紙對這個議題的重視程度，不似新加坡報紙那麼顯著地著重在雙邊關係的報導上。從兩國報紙對主要議題內容的報導量來說，可看出兩國媒體對不同主題的關注程度，從中反映各國立場，顯然各國媒體與國家立場及國家利益是相契合的。

2. 馬新報章對大橋課題的新聞數量、新聞偏向和框架有何異同？

一、新聞數量

從各報新聞則數的分布看來，馬來西亞對大橋課題的關注顯然較新加坡為多。馬來西亞報章《星洲日報》的報導量佔了 62.4%，新加坡報章《聯合早報》只有 37.6%，數量差距很大。從新聞則數的處理來看，可看出各國媒體立場與國家立場是相輔相成，互相呼應的。馬來西亞政府自 2003 年 1 月開始宣布，即使新加坡不同意，馬國政府堅持單方面興建大橋，當地的《星洲日報》也隨之呼應，頻頻報導

與大橋課題相關的消息，以在國內製造輿論氣氛。而新加坡基於興建大橋對她毫無好處，弊多於利，港務業和經濟發展反而恐受影響，因此一直不贊成興建大橋，對大橋課題採取冷處理的手法，並不積極報導，顯然不希望民眾對此議題有太多的議論。由於新加坡立場與馬國相反，這同時反映在兩國媒體新聞報導的則數上。

二、新聞偏向

《星洲日報》支持所在地國家馬來西亞的百分比超過半數，同樣的，《聯合早報》也較為支持新加坡，不過保持中立的百分比卻超過半數。至於《聯合早報》支持中立立場的新聞數量較支持新加坡的新聞數量還多的原因，主要是由於《聯合早報》的新聞有相當多是轉述自馬來西亞，而對這些新聞多採取中立立場，才會出現百分比比較支持新加坡立場為多的情況。

另一方面，雖然馬新的兩份報章在對鄰國的支持度上大量抱持中立的新聞報導，但數據結果顯示新加坡較容許國內報章在報導雙邊課題上，站在鄰國立場刊登新聞。這與新加坡一向貫徹的政治文化有很大的關係。新加坡的政治傳統為以法治國，凡事講求證據，而且崇尚法律精神，因此《聯合早報》內一些刊登的新聞是政治人物的講話全文，完全體現了國家貫徹的法治精神。

而馬來西亞的《星洲日報》在支持所在地政府的測量重，大幅度地表達支持立場，明顯地支持馬國政府，不支持的百分比只佔很少數。這應證了Wong（2006）所強調的媒體和政府的夥伴關係（media-government partnership），媒體必須服膺於國家經濟發展的步調。馬新兩國曾是被殖民的國家，在建國的過程中，發展媒體理論可以很好地把政府政策傳達給人民，推動經濟發展，維護社會和諧，這樣的媒體控制一直延續到現在，而缺乏自主性的媒體也習慣這種以「亞洲價值觀」為核心的思想型態，以致在涉及雙邊關係的課題時，兩國媒體也遵循發展媒體理論的脈絡，傳達對國家利益有幫助的新聞報導，以形成人民集體的意識形態，與政府抱持相同的立場。

三、新聞框架

雖然兩份報紙在經濟和外交的框架角度都大量分布，但就個別報章的框架角度看來，《聯合早報》很明顯地著重在外交方面，百分比超過半數。這顯然與新加坡政府的立場有相當大的關係。由於新加坡當局並不願興建大橋，因此對於大橋的興建絲毫不感興趣，而這個立場也呈現在新聞報導上。新加坡是因為馬來西亞決定興建大橋，才願意與馬國商談相關大橋事宜，新聞報導的焦點多集中在與馬國的談判進展、細節、條件，以及兩國的雙邊關係上。這也因此造成《聯合早報》在框架大橋課題上，大量地以外交角度為框架。

雖然兩份報紙主要都以外交和經濟來框架大橋課題新聞，但《星洲日報》並沒有大量以外交角度為框架，反而和經濟框架的百分比相近，都是在45%左右，沒有壓倒性地超過半數。這顯示《星洲日報》對這兩方面的關注程度不分軒輊，幾乎達到平衡的框架。但從排序上看，《星洲日報》顯然還是較著重外交框架，政治人物

爲了爭取民眾支持建橋計畫，在外交上和新加坡談判時，頻頻發表有關政府決策的言論，以鞏固政府立場，加強繼續建橋工程的合理性，並引導民意。

《聯合早報》超過半數的新聞量的框架功能是引導民意，而通過受訪陳述的框架手法所取得新聞量最高的。這顯示《聯合早報》所刊登的新聞大多爲消息來源受訪的陳述，而消息來源也借媒體這個管道，來達到引導民意的作用。在《星洲日報》方面，引導民意和鞏固政府立場都佔相當多的百分比，而框架手法主要採用記者會陳述、受訪陳述、言論發表這三種。這顯示報章藉由詢問消息來源或引述消息來源的談話，來達到引導民意和鞏固政府立場的目的。

3. 馬新報章的新聞報導會否和國家立場、國家利益一致？

從上述的研究發現顯示，馬新兩份報章《星洲日報》和《聯合早報》在新聞數量、新聞議題內容、新聞偏向和新聞框架，都有明顯支持所在地國家的傾向。不過在保持中立態度方面，《聯合早報》較《星洲日報》爲優，這可從《聯合早報》轉載馬來西亞報章新聞的舉動看出。同時《聯合早報》也傾向於刊登政治人物的講話全文，而不是由報章記者詮釋後，寫成新聞再刊出，這也使到《聯合早報》在框架同一雙邊大橋課題時，較《星洲日報》傾向中立的態度。

而兩國的政治文化也是造成這兩份報章新聞報導的差異。馬來西亞政治人物所發表的談話較爲情緒化，除了希望在民間製造興建大橋的輿論外，也企圖通過妖魔化新加坡，使人民倒向政府一方，反映在新聞報導上，顯示《星洲日報》的新聞具有較多情緒化的字眼。相反地，新加坡的政治文化崇尚法之精神，一切講求證據，政治人物不會以情緒化的字眼來引導民意，而是將一些談話、信件內容公佈在媒體上，讓民眾自行分辨何者爲真，而反映在新聞報導上，顯示《聯合早報》的新聞報導較於理性與中立。雖然兩份報章在新聞呈現上具有差異，但媒體所抱持的立場，其實與國家立場一致，並以維護國家利益爲基準，報導框架與國家利益息息相關，也與政府立場相符，以達到教育民眾，向民眾傳達政府政策、立場和原則的功能，與政府保持夥伴關係。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國的雙邊關係，是個很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由於兩地文化存有差異，對中英文的重視程度也有所不同，因此從兩國報紙的新聞數量來看，也出現相當大的差異。馬來西亞華文教育根基扎實，閱讀華文報的讀者群眾多，《星洲日報》的版面較多，所報導的新聞相較之下也比較多；而新加坡政府不太重視華文教育，民眾多以英語溝通，華文報《聯合早報》也不如新加坡國內的英文報那樣被重視，版面較少，因此新聞數量相較之下比《星洲日報》來得少。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也許能夠以兩國的英文報章作爲比較的對象。這是因爲兩國都是多元種族的國家，英語是溝通各民族的重要語言，以英文報章新聞作爲研究對象，可能會發現另一嶄新的角度。

此外，本研究主要探究國家利益影響報章框架雙邊課題，但對於政治制度、政治型態，以及社會文化方面的影響卻沒有深入研究，未來可以從政治或文化方面的

第五屆世界華文傳媒與華夏文明傳播學術研討會（台北 2007）

角度切入，看兩國報章如何因兩地文化的差異，使報章的框架有所區別。本研究也建議，未來可以朝國家角度和框架的結合作更多延伸。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王石番（1989）。《傳播內容分析法—理論與實證》。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李人豪（2004）。《政治人物表演行為的媒體再現—以立法委員的電視新聞報導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靜伶（1999）。〈新聞框架與意念的再現—論題取徑的分析〉，《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9(4):590-607。

吳碧娥（2004）。《財經專業報紙失業議題的框架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仲軒（1994）。《論國家利益：國際關係理論面的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

梁慧玲（2004）。《兩岸三地國際新聞報導之比較—以美伊戰爭期間的人民日報、蘋果日報、聯合報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昆宏（2003）。《中共大國外交政策的國家利益分析》。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

臧國仁（1999）。《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台北：三民。

報紙

《聯合早報》（2003年2月15日）。〈即使沒獲得新加坡合作 馬國決建大橋〉。

《聯合早報》（2003年2月15日）。〈我敢向上蒼發誓，我沒說騙話……——馬哈迪在新山主持動土禮上講話全文〉。

《聯合早報》（2003年2月25日）。〈新柔長堤不應拆除〉。

《聯合早報》（2003年11月22日）。〈柔佛建新大橋 通新加坡水管須遷移〉。

《聯合早報》（2006年2月18日）。〈吳總理：馬哈迪是“編故事能手”〉。

《聯合早報》（2006年3月6日）。〈外交部：對大橋課題立場不變〉。

第五屆世界華文傳媒與華夏文明傳播學術研討會（台北 2007）

《聯合早報》（2006 年 4 月 13 日）。〈馬宣布不建彎橋〉。

《聯合早報》（2006 年 4 月 15 日）。〈馬宣布不建彎橋 吳資政：不影響新馬關係〉。

《聯合早報》（2006 年 4 月 26 日）。〈放棄美景大橋計畫引起爭議 馬巡迴大使公佈來龍去脈〉。

網路資料

〈華文媒體 馬來西亞〉（無日期）。取自江蘇僑網網頁
<http://www.jsqw.com/hwqq/malaixiya.htm>

〈馬來西亞主要新聞媒體〉（無日期）。取自中華人民共和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網頁
<http://www.fmprc.gov.cn/ce/cemy/chn/malaysia/t171735.htm>

〈馬來西亞華文報刊概況〉（2005 年 8 月 16 日）。取自中國新聞網
<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5/2005-08-16/26/612499.shtml>

〈早報之道—專訪新加坡《聯合早報》總編輯林任君〉（2006 年 3 月 23 日）。取自北京大學世界華文傳媒研究中心
<http://www.cmc.pku.edu.cn/INC/Browse.aspx?ID=851>

莊迪澎（2006 年 11 月 30 日）。〈首要媒體前鋒報星洲賺大錢 季度淨利高幅增長 34%-93%〉，《獨立新聞在線》。取自
<http://merdekareview.com/news.php?n=3072>

莊迪澎（2005 年 4 月 5 日）。〈「媒體評論」中文媒體引狼入室，多元輿論空間萎縮〉，《破媒體傳播網：莊迪澎文存》。取自
<http://postmedia.blogspot.com/2005/04/blog-post.html>

張威、周秀芳（2001）。〈《星洲日報》（1965-1979）〉，世界華人新聞媒體與華夏文明傳播學術研討會論文，8 月。上網日期：2002 年 3 月 27 日，取自新聞與傳播學院先鋒論壇
<http://www.ldxw.org/bbs/TopicOther.asp?t=5&BoardID=15&id=2342>

英文部分

D. McQuail. (1996) 《大眾傳播理論》（潘邦順譯）。台北：風雲論壇。

Entman, R.M. (1993).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51-58.

Lee, C. & Yang, J. (1995). Foreign news and national interests: Comparing U.S. and Japanese coverage of a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Gazette*, 56, 1-18.

Maslog, C.C., Lee, S.T., Kim, H.S. (2006). Framing analysis of a conflict: How newspapers in five Asian countries covered the Iraq war.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6(1), 19-39.

Morgenthau H. J. & Thomson K. W. (1985).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Tankard, J. W., Jr., et al.(1991). *Media frames: Approaches to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EJMC convention, Boston, August.

Trowler, P. (1988). *Investigating the media*. London: Unwin Hyman Limited.

Wolfsfeld, G. (1991). Media, protest, and political violence: a transactional analysis. *Journalism Monograph*, 127.

Wong, K. (2004). Asian-based development journalism and political elections: Press coverage of the 1999 general election in Malaysia. *Gazette*, 66, 25-40.